

品质革命,文艺更需要、任务更艰巨

□白 烨

继在2016年5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品质革命”之后,李克强总理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这里的“品质革命”,主要是指适应人们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和民族复兴的远大宏图,部署促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更好满足群众消费升级需求,使我们国家更好更快地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但“品质革命”这一概念葆有的宗旨、蕴含的精神,对于文学文化领域不仅完全适用,而且有很大启示。

在我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的发展演进中,经由不断地分化与繁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相互借力,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相互影响,总体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繁与丰沛样态。但毋庸讳言,当代文学给人的普遍感觉是“多而不精,繁而不荣”。也就是说,在写与读、供与需的基本关系上,还存在着质量很好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与产品供给不足,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问题。文学艺术领域,无论是作品的创作与生产,还是作品的传播与消费、多样与丰繁中,优良优质的作品数量并不很多,而通俗与低端的作品比比皆是,更为流行的则是那些旨在消遣消闲的娱乐化作品与产品。这样一个总体向好又带有不良倾向的现状,明白无误地向人们表明:文艺、文化领域,同样需要“品质革命”,而且更为迫切,任务更为艰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在对社会矛盾

的认识与揭示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不平衡”问题和“不协调”现象,表现在文学和文化层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文艺作品问世,但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和欢迎的作品却为数不多。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既有文艺创作中出于精雕细刻的精品力还为数不多的问题,也有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不仅越来越多样化,而且审美趣味也在逐渐提高的问题。我们文艺作品的创作与生产,还没有完全与这种需求相适应。甚至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又接踵而来。这都使得在文学艺术供给上,通过创作和生产优秀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提升的精神需求,已经成为紧迫和严重的要务。事实上,只有真正做到作家下去了,创作上去了,作品提高了,品类丰富了,才能逐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谈到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实问题。

当然,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基于个人艺术创造的特点,基于从生活到艺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这又决定了文艺创作的艺术进取和文艺作品的质量提升,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文艺界也通过作协、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扶持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彰奖优秀文艺创作成果,以文艺评论方式推进文艺作品的“经典化”,正在朝着构筑文艺时代高峰的方向努力。近来影视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给人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等在观众中引起较大反响,表明人民群众需要的是既有正向的精神能量又有着精美的艺术含量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都还是凤毛麟角。所以,适应人民群众日

■评 论 才华需要庇护和温暖——读诗选《我听见了时间》 □丁 鹏

近日,由《诗刊》社编选的《我听见了时间:崛起的中国90后诗人》正式出版发行。全书收录120位“90后”诗人共计约770首诗作。翻开这套诗选,最直观的印象正如作者之一郭月洲所写的“他们在发光”:每一张照片都充分展示整个集体的活力与自信,每一首诗歌都努力呈现最具个性的诗思与风格。此时,距“90后”诗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于《诗选刊》的2007年第11、12期合刊“90年代”小辑,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

10年来,“90后”诗人备受关注,也饱受争议。其受到诗坛持续关注的原因与其说是作品中呈现出了某种具有辨识度的集体记忆或总体风格,不如说是因其“新秀未茁”的身份。

从2007年末到2018年初,“90后”诗人似乎仍未走出漫长的青春期。而10年前,“90后”诗人却已经有了心智早熟、文词老辣的惊艳出场。正如张清华所说:“这确是语言和心智早熟的一代,仿佛越过了语言的青春而直达成年的头脑,读他们的诗无法不让我感到兴奋,并对汉语神奇的未来充满期待。”集中于“90后”诗人身上的早熟与“巨婴”的悖反其实释放了两个信号:首先,诗坛对于“90后”诗人仍然缺乏深刻认识,或者说仍然

没有郑重对待;其次,“90后”诗人对于自身身份的确认也缺乏深层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只是停留在内部的互动。

“90后”诗人所受的争议首先是代际划分与命名的合法性问题。“90后”诗人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00年之间出生的诗人。这一划分方法业已成为处理代际问题时便利而有效的操作系统,但同时意味着“90后”诗人的概念是被建构起来的,是不断生成的。这就需要批评家们在粗糙的代际划分的基础上进行更细致、更基于文学层面的处理,以挖掘其持久的生命力。“90后”诗人所受的另一方面质疑是这一集体尚未产生足具代表性的诗歌,甚至诗句。而诗坛给予其持续而大力扶持的重要背景,不仅有“90后”诗人自身的“崛起焦虑”,更有汉语新诗自身的“成熟焦虑”。

早在1998年,郑敏就在《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中论断:“汉语新诗在量与质方面都还是在幼儿阶段,前有古人的大师级作品相比,今有世界的众多成熟的作品要面对,而汉语新诗还在寻求自己的形象。”18年后,洪子诚在谈到新诗百年时依然感慨:“‘危机’和‘出路’每隔若干年就要旧调重弹。诗人和批评家被迫也要絮絮叨叨;来证

立足乡土文化 书写现实命运——“周口作家群”的文学意义 □任 动

和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其标志之一就是“周口作家群”的呼叫文坛。新时期以来,“周口作家群”潜心创作、求新求变,使周口文学呈现出繁花似锦、百鸟争鸣的良好态势。

周口作家之所以称为群,因为不但队伍庞大,而且还具有共同的特点。一是鲜明的地域特色,浓郁的乡土气息,展卷便闻一股豫东泥土的芳香,历史积淀、风俗文化都在里面搅着,具有独特的韵味。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几千年来,乡土情怀一直都是最纯真、最传统,最值得书写的。所以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是基于农村的生活体验和想象,尤其是周口作家,最擅长的就是这个。二是语言的质朴鲜活,原汁原味。比如刘庆邦的小说,那是真正的豫东调,读他的作品,像是走在历史里,走在童年,让人不忍释卷。三是对于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四是写实主义的风格。这些鲜明的创作特色,说明“周口作家群”经历了形成、成长到成熟的过程。

从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调节其生长的土壤气候,为多出优秀作品优秀人才营



明自身的合法性。漫长、持续的纪念,在郑重、庄严之间也是无奈。”孙绍振在《新诗百年:未完成的中西诗艺转基因工程》中甚至有一个更为直观的推测:“也许,为成熟的新诗艺术加冕,还需要100年。”

在汉语新诗“成熟焦虑”的大背景下,诗坛对“90后”诗人的一系列扶持动作其实是汉语新诗的战略性转向——从回顾、总结转向展望、发现;从“各代都以为新诗从我开始

造氛围和搭建平台,是时代赋予文学艺术的历史使命。在推动周口文学艺术事业前行的多元力量中,“周口作家群”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的重要队伍。

“周口作家群”人才济济,主要由两部分作家组成。一是本乡本土养成并扎根本土、勤奋进取的作家,二是从本乡本土走出现今旅居在外,但心系故乡的周口籍作家,年龄结构均衡,写作梯队整齐,作品题材丰富,创作门类广泛。“周口作家群”为了在文坛发出自己高亢而独特的声音,充分全面地展示创作的繁荣,目前已经出版了《颍河作家丛书》《绿地丛书》《周口作家丛书》《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中原之星文库(第二辑)》《“诗韵阳城”诗歌丛书》等多套书系,充分展示了“周口作家群”的创作成绩。

“周口作家群”本土作家中,不但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中、老年作家如梁庭华、王猛仁、孙新华、邵超、张华中、申艳、李前进、贺红、孙琳、韩冰、再见康桥、马银良、柳岸、尉然、等,还有一批思想新锐活跃、创作势头强劲的新生代作家如黄献、郭敦、戚富岗、彭进、

我们需要在更新价值观念、丰富精神情怀、扩展艺术胸怀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现实,联系创作实际,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去提高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能力,去调动直面现实的创作能力,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把个人的创作追求与当下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有助于把文学的发展进步与时代的使命担当联系起来,更加自觉也更加自信地走好既具有个人特色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之路。

我们所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新时代,作家艺术家需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在更新价值观念、丰富精神情怀、扩展艺术胸怀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现实,联系创作实际,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去提高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能力,去调动直面现实的创作能力,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的浮躁心态”转向诗歌火种的代际传递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非诗的争论与内耗转向“一个承认变,而又祥和的诗歌氛围”。

近年来,文学界纷纷聚焦“90后”:《诗刊》开辟“90后诗人特辑”、《人民文学》开设“九〇后”栏目、《文艺报》与《作品》联办“90后推90后”栏目等等。2017年12月,一篇名为《看完这些孩子的诗,甘拜下风》的推送刷爆了朋友圈,将姜馨贺、姜二嫚、铁头等一批“00后诗人”集体推到公众视野里。江山代有才人出,“00后”诗人的华丽登场,意味着“90后”诗人走出了“漫长的青春期”,从新秀变成“故材”。

10年来,诗坛对“90后”诗人的扶持就像尼采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说的“给天才以正确的教育和爱护”。虽然“天才的真正来源并不在教育之中”,但“如果没有这个庇护和温暖他的故乡,他将永不能展翅作他永恒的飞翔,而会被悲惨地困在时间之中,像一个流落在冬日荒原的异乡人,从贫瘠的土地上蹒跚离去”。诗坛对“90后”诗人的期许是具有独特嗓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90后”诗人个体的脱颖而出;是“90后”诗人经过充分地准备与演练之后,与前代的诗人们同台争辉。在这个意义上,《我听见了时间》的出版既是对“90后诗人”的大规模展示,也是阶段性小结。

红鸟、飞鸟,孙全鹏、霍楠固、柳雨吟、张赫等等,“周口作家群”中,还有一大批从本乡本土走出现今旅居在外、但心系故乡的作家如刘庆邦、邵丽、孙方友、墨白、朱秀海、赵兰振、谷禾、刘迅甫、李鑫、梁彤瑾、马泰泉、叶建民、王岭群、蒋建伟、刘海燕、陈麦启、郭昕、齐红霞、子奥等。他们各自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共同构建了周口文学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周口作家群”的日益壮大,是“中原作家群”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因此改变了“中原作家群”的整个创作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道出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中国梦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理想。在文化激荡、思想交锋、价值碰撞的社会转型期,中国梦正在弥合裂痕,凝聚共识,重塑一个社会的精神价值。“实现中国梦的三个重要保障是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其中,中国精神最能形象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因为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周口作家群”创作的作品为中国梦的实现,弘扬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日益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作出了积极贡献,也把“周口作家群”这个亮丽的文化品牌擦得更亮。

■关 注

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一个人人参与艺术生产、艺术传播和艺术批评的“人人时代”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批评领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以网红大V、企业家、媒体人为代表的“新批评群落”屡屡发出与专业艺术家和主流艺术界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品评作品,引领舆论,影响生产,在艺术批评领域释放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专业人士的批评话语权越来越广泛地被蚕食、被瓜分、被围困、被重组,专业批评的式微以及专业批评家影响力的日渐消磨已经成了一个必须直面的事实。面对来势汹汹的“跨界批评”,专业批评几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实事求是地说,艺术领域的跨界批评,既是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表征,也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必然产物。互联网时代,跨界是一件顺应潮流的事情。商业跨界、技术跨界、产品跨界、服务跨界,可谓是行行跨界,人人跨界。跨界总是和创新联系在一起,和变革联系在一起。就其本质而言,跨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传统社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重塑。跨界是个好事情,一则有助于打破界限,跨越鸿沟,实现更深层次的互联互通;二则有助于开阔视野,创新思路,实现在原有的壁垒中无法想象的突破。成功的跨界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脑洞大开,而且会大大拓展产业发展的路径,获得一种颠覆式创新的可能性。

具体到艺术批评领域,跨界批评可以说是信息技术革命给传统的艺术生产和艺术批评领域带来的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机遇。在传统媒介主导艺术批评的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一直操控着信息传播,观众往往处于被动接受艺术信息,片面接受艺术评论的状态,缺乏自我观念和意见的表达,一切唯主流之马首是瞻。互联网具有的开放、平等、互动、虚拟以及重塑时空的特性,在大大拓展艺术作品生长空间的同时,也在有力重塑着艺术批评的生态。在新媒体、全媒体的背景下,艺术受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艺术批评不再是少数人和少数机构的特权,谁都可以发表议论和评价,谁都可以点赞或吐槽,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被冲垮,专业评论的中心化结构被打破,普通受众、非专业人士获得了真正面向艺术发出声音的可能和机遇。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不知不觉间突破了“圈子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自我封闭、自以为是和顾影自怜,获得了和受众对话前所未有的便捷性、丰富性,获得了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鲜视角和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艺术批评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审美情趣、审美价值观的多元化得到了充分张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跨界批评的兴起,艺术批评正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对于艺术和艺术批评而言,这都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红利。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跨界批评的迅猛发展在促进了艺术批评的多元化、民主化的同时,也使得艺术批评自身陷入了一种随意、芜杂,甚至趣味低下、价值混乱的状态,艺术批评的专业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蚕食和围困。形形色色的网红大V以及为数众多的企业家、媒体人要么以票房论英雄,以吐槽代评论,要么以媒体报道代替艺术分析,以得失与否作为评判标准。其结果是,直观的判断越来越多,理性的分析越来越少;碎片化的感慨越来越多,系统化的研究越来越少;看热闹的起哄越来越多,看门道的思考越来越少;跨界评论的戾气和警句广为流传,专业人士的深度评论和深入见解不见了踪影。更有甚者,在艺术评论的生态圈中,存在着不同程度操纵舆论的恶劣现象。比如,搞粉丝以号令天下,以为人多势众就有理,老虎屁股摸不得;比如,携金钱买通媒体,以为有钱就是有理,没理也会变为有理,以至于自欺欺人而不自知,在花钱买来的好评中自以为是、不可一世;又比如,有话不好好说,有理不好好讲,热衷于提炼怪话、狠话、俏皮话、极端话,热衷于附会生活槽点、舆情热点、社会痛点,不求实事求是理据相契,但求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由此以来,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和娱乐至上,这些在艺术批评中本应竭力避免的东西反而成了艺术批评的“主旋律”。这种乱象恐怕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即使你現在是一定的受益者,长此以往,其对艺术的危害、对社会的危害一定会波及艺术生态圈中的每一个个体。这个问题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问题,而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

古语讲,术业有专攻。它的意思是说,每个行当有每个行当的规范,每个行当有每个行当的门槛,这些规范和门槛正是决定这个行当的独特性及其社会价值的基本条件,没有规范和门槛的行当不可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独特的价值。换句话说,尊重专业才是创造价值的前提。艺术批评通过对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的具体评析,揭示其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探讨艺术创作和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激浊扬清,推陈出新,繁荣文艺创作,弘扬时代精神。它是哲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诸多学科专业知识的综合性应用,是一个有其自身规律、规范、理论和方法体系的专业领域。为了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任何时代,艺术批评都需要自我省思,自我突破。因此艺术批评需要跨界,并欢迎跨界。但是,真正有益的跨界不是“无知者无畏”的大胆搅局,而是以尊重专业主义为前提的谨慎创新。对于跨界者而言,有独立的批评精神也好,有独到的批评视角也好,但这种“独立”必须建立在尊重事实、敬畏专业的基础上,必须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为前提,而不是比谁嗓门大,比谁说话狠,比谁更善于把商业逻辑混同于艺术逻辑,比谁更善于把自己与艺术毫无关系的社会资本巧妙挪移到艺术批评。

企业家不是百事通,媒体人不是万能的,网红大V更不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才,考虑到自己广泛的社会影响,对自己不熟悉的专业问题进行跨界批评的时候,更需要谨慎和克制,而不能意气用事,妄下断语,逞一时之快。换句话说,创新是检验跨界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假如跨界批评只能带来喧嚣和芜杂,甚至是对专业精神的伤害,而不能促进艺术繁荣和艺术批评的深层次创新,那么,这样的跨界需要警惕。

批评讲专业 跨界须谨慎

□张 跣